

丝路华光映平城 学术薪火传武周

——“丝路文明视野下的云冈模式”专题研讨会小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研讨会现场

丝路华光映平城，学术薪火传武周。4月11日，由云冈研究院主办，云冈学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石窟寺保护与传承山西省重点实验室、石

窟寺保护与传承山西省文物局科研基地、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生态研究院承办的“丝路文明视野下的云冈模式”专题研讨会

在云冈研究院一楼多功能会议室召开。此次会议汇聚了国内石窟寺研究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旨在从更广阔的文明互鉴视角，深入挖掘“云冈模式”的历史内涵、艺术特征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辐射影响力。

会议在上午9时准时拉开帷幕。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教授首先致辞。杭侃指出，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王朝留给世界的文化瑰宝，不仅是石刻艺术的高峰，更是“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流、鲜卑民族与汉民族文化融合的辉煌见证。他强调，随着云冈学研究联盟的成立以及云冈学建设的不断深入，对“云冈模式”的界定不应停留在宿白先生提出的石窟寺考古分期层面，更应将其置于全球视野下，探讨其在政治、宗教、艺术及民族认同上的深远影响。

会议议程紧凑，学术氛围浓厚，共分为两场进行。上半场的报告聚焦于“云冈模式”的溯源与界定。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常青做了题为《后秦“长安模式”与“云冈模式”的关系》的首场报告。他通过对长安地

区现存遗迹的梳理，详细论述了“云冈模式”形成的源流，为与会学者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随后，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北朝文化研究室主任郭静娜在《“北魏平城佛教石窟群体系”与“云冈模式”》的发言中，提出不应孤立看待云冈石窟，而应将其与大同周边的鹿野苑、鲁班窑等北魏小型石窟视为一个整体体系，从而更完整地还原北魏平城时代的佛教景观。涇川县博物馆研究员杜赞清与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武夏则分别从涇州（今甘肃涇川）与南涅水（今山西沁县）的个案入手，展示了云冈样式向外的强力辐射。杜赞清指出，涇川地区的北魏造像在佛像造型与装饰细节上明显受到云冈二期的影响，是“云冈模式”西渐的重要实证。

而南涅水窖藏发现了805件石刻。其中，北魏、东魏、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和石刻的出现，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有直接关联。迁都后，洛阳与平城之间的往来交通日益繁忙，官吏、商贾、旅客频繁往返，南涅水正位于这条交通

线上。一些鲜卑族人选择在涅水河两岸定居，他们在这里的寺院进行了大量功德活动，促进了当地佛教的兴盛。同时，当年参与开凿云冈石窟的工匠也随南迁，他们在涅水河两岸利用当地砂石，雕刻佛教造像，供奉男信女膜拜。

下半场的研讨则侧重于“云冈模式”的传播路径与南传证据。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师秦艳兰的报告《“云冈模式”南传的重要例证——山西太谷塔寺摩崖造像的调查与研究》（与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王炜合作）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高度关注。该研究团队通过近期在晋中的详细调查，确认太谷塔寺摩崖造像在组合形式与雕刻技法上，与云冈石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为“云冈模式”跨越太行山向南传播提供了关键的地理坐标。

学者宋瑞则以宏阔的视角分享了《“云冈模式”在晋豫及其以东地区的传播》报告，通过对晋东南及河南北部石窟寺的对比，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云冈样式”传播地图。他指出，随着北魏迁都洛阳，云冈的艺术风格并未消失，

而是通过与中原传统文化的结合，成为了北方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基石。

在热烈的研讨环节，与会学者围绕“丝绸之路”与“云冈模式”的双向互动展开了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云冈石窟不仅是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起点，更是北魏政权通过集聚凉州、西域乃至中亚的工匠与人才，实现的一次文化自信的展示。这种“模式”确立了一种国家意志主导下开凿大型石窟寺的规范，其影响力随丝绸之路的延伸，远播至中原腹地乃至南方。

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是对宿白先生提出的“云冈模式”的致敬与深化，更是新时代背景下，云冈学建设走向精细化、体系化、国际化的重要一步。通过跨区域、多维度的比较研究，云冈石窟作为丝绸之路节点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凸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未来，云冈研究院将继续依托重点科研基地，深化学术研究，让凝结在石头上的文明记忆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复旦大学教授来云冈作专题讲座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王金华教授应邀作专题讲座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近日，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王金华应邀赴云冈研究院作《我国石窟寺渗水病害特征与防治策略研究》专题讲座。

本次讲座立足于我国石窟寺保护的现实需求，系统梳理了石窟寺病害分类体系，深入剖析了渗水病害的形成机制

与区域特征，提出了基于“径流区关键区域”“微渗流系统”评估方法体系的新理论，为石窟岩体裂隙渗流精细探测、评估和微小裂隙渗水病害的评估与治理提供了科技支撑，也为我国石窟岩体裂隙渗水病害的防治提供了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思路。

石窟寺依托自然地质体建造，既具有石质文物本体结构失稳、风化破坏等病害，也具有地质体的危岩体、地下水渗流等地质病害，病害类型复杂，区域特征显著。王金华教授指出，石窟寺病害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石窟寺环境地质病害与载体岩体病害”，包括危岩体、滑坡、地下水剥蚀等；二是“石窟寺文物本体病害”，包括开裂失稳、水侵蚀、风化破坏等。其中，渗水病害是威胁石窟寺安全保存的最主要病害之一，保护形势十分严峻。石窟寺水害类型复杂多样，主要包括大气降水、凝结水、毛细水、裂隙渗水及地层孔隙水等。其中，裂隙及地层渗水对石窟寺安全保存影响最为严重。

通过云冈石窟、乐山大佛、大足石刻、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典型案例的分析，王金华教授总结了石窟寺水害的四大特征：一是水害类型复杂，呈现多尺度结构组合的渗流体系；二是呈现显著的季节性特点，与季节性降水及环境条件密切相关；三是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渗水病害形成机制多样，既有裂隙通道的裂隙水水害，也有地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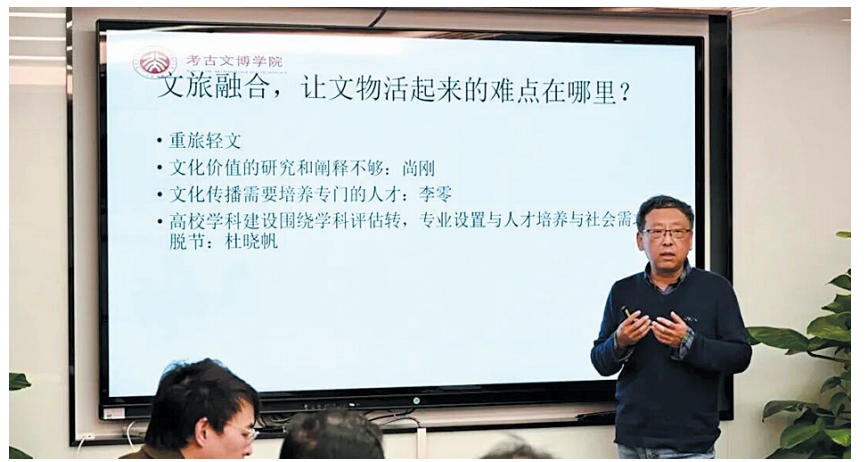
孔隙水水害；四是砂岩质石窟岩体裂隙渗水病害以毫米级微小裂隙渗流通道为主体，渗水通道狭窄，水力联系微弱，渗流动力学机制复杂。由此，王金华教授提出了“精细水文地质学”新理论，突破了传统水文地质学“补给区—径流区—排泄区”的宏观分析局限。

基于上述理论，王金华教授结合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龙门石窟潜溪寺等石窟水害治理的经验与教训，立足于云冈石窟渗水病害特征、危害性和渗流机制，提出了分区分类构建精细水文地质模型，实现从常规工程模式向“微观机制、精准干预、疏堵结合”转变的防治策略，为云冈石窟水害治理提供精准技术路径。

讲座结束后，王金华教授与云冈研究院研究人员就云冈石窟具体洞窟的渗水机制、云冈石窟渗水病害防治策略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会场讲座以丰富的案例与扎实的理论为支撑，系统讲解了石窟寺渗水病害的特征、机制与防治策略，为我国石窟寺保护实践及云冈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技术启发。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讨会举办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应邀作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谭澍周会（第五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讨会，杭侃在作报告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日前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三十四章“大力繁荣文化事业”中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专门部署，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治理现代化指明方向。4月1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国家文物局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遗产创新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谭澍周会（第五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讨会举办。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应邀作报告。

研讨会上，杭侃以《遗产与旅游、文物保护与文化遗产》为题作报告。他以云冈石窟“旅游热”为例，提出文化遗产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保护核心在

于对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阐释与传承，以此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在实践中，云冈研究院运用三维扫描、数字复原等科技手段拓展展示方式，并面向不同群体开展分众化传播。杭侃表示，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仍面临3个难点：重旅轻文、阐释力度不足、学科建设薄弱等，他强调需转变观念、培养人才，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

本次研讨会汇聚多方智慧，聚焦关键议题，为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支撑。活动搭建了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进一步凝聚了行业共识，为促进文化遗产价值传播、助力中华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客观记录考古报告 科学分析类型分期

本报记者 赵小霞

4月10日，云冈研究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冈学建设系列讲座”开讲。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应邀作《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与类型学分期研究方法》的专题讲座。

讲座围绕石窟寺考古工作全流程展开，常青系统讲解了石窟考古报告编写与类型学分期研究方法，为石窟寺调查、记录、整理与研究提供完整的方法论指导。

文字记录、影像拍摄、拓片制作、实测测绘等是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的基础性工作。它们有统一的标准与要求。文字记录遵循从大到小、从外到里原则，按洞窟、造像龕、造像、装饰图案逐层记录，同步测量尺寸保障信息完整；影像拍摄需由专业人员完成，遵循相同逻辑，全程编号归档，信息对应，完整还原石窟全貌；拓片用于留存浅浮雕纹饰与文字信息，是重要记录补充；实测测绘需融合科学实测与素描，在有限的图纸空间内呈现最大化有效信息。

内容总录、调查简报、正式报告是由简至繁、由基础到完整不同的田野调查记录。其中“内容总录”属于基础性客观记录，核心工作是窟龕统一编号，按照编号依次进行客观描述，内容可简可繁，不加入任何主观研究与判断；“调查简报”是在内容总录基础上形成的精简研

究性文本；“正式报告”是对调查简报的全面细化与深化。同时，编写报告需合理配置内容比例，客观描述占报告比例约三分之二，其余为年代、题材考证、历史背景分析等研究内容。文末需规范列举参考文献、窟龕内容登记表、大事年表等，还可专门增设对应名词、人物、年号等内容的索引，便于读者查阅和使用。

讲座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关于石窟寺类型学与分期研究方法。对石窟寺进行分类、型、式的划分，是为分期断代服务的。石窟寺研究需先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期，即对各类造像的形制差异进行区分。随后依据各类造像的不同时代风格差异进行分期。分期与断代分期则以型、式划分为前提。首先以造像共存关系为基础进行分期，再以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的早晚关系为基础进行年代排序，最终归纳分期。在分期完成后，以各期造像为依据开展时代背景研究，揭示不同阶段的历史、宗教与社会内涵。

讲座之后，常青与云冈研究院青年学者围绕三世佛信仰体系、释迦多宝等学术问题展开深入交流。整场讲座立足石窟寺考古工作实际，强调客观记录为先、科学方法为要，为石窟寺考古与研究提供了清晰、规范、可操作的学术路径。

四月的云冈 不止有桃花

——从梁林考察到世界遗产

付洁



云冈石窟赏桃花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林徽因写下这首诗时，心里装着怎样的春光，我们无从知晓。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诗里的四月天，和今日云冈的四月天，隔了将近一个世纪，在这武周山下，终于相逢了。

四月的云冈，正是桃花漫山的时节。武周山连绵起伏，山花一树一树地开，从山脚一直漫到石窟脚下，青翠的松柏与粉白的桃花相映成画。

庄严雄浑的北魏石刻造像在千年石壁上静默不语，低头却是满树繁花摇曳风中，历史与自然在这里悄然交融。残年的老人，亟待保护。住宿条件更是落英缤纷——这样的四月，美好得几乎不真实。

然而，在云冈的历史上，曾有一位与“四月天”深深相连的女子。1933年9月，梁思成、林徽因一行来到大同，彼时不是林徽因笔下的“人间四月天”，而是“秋九月”。他们本计划直奔云冈石窟，却不巧“天雨道泞，云冈之行只能暂缓”，只得先测绘城内的华严寺、善化寺。待到天晴路干，奔赴武周山下时，已是9月6日下午。塞上九月，高粱红成一片，玉米织成的“青纱帐”在风中沙沙作响，像在欢迎这群从北平远道而来的学者。

衣，夜里盖棉被还冷得缩成一团”。每天的主食不过是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就是在这般条件下，梁思成、林徽因与刘敦桢、莫宗江等营造学社同仁，在云冈进行了为期3天的实地考察，测绘、摄影、记录，为这座沉寂千年的石窟留下了第一批系统的建筑学档案。

考察结束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共同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第一次从建筑学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文化价值。他们在文中写道：“这灵岩石窟更是后魏艺术之精华——中国美术史上一个极重要时期中难得的大宗实物遗迹。”这一评价，一举奠定了云冈石窟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重要地位。

梁思成在文中还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洞见：在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渗入旺盛而有力的外来影响——它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腊、波斯、印度，通过南北两路，经西域各族到达内地。正是这种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赋予了中国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云冈石窟，便是这种现象最明确的实证——古印度犍陀罗艺术、波斯装饰纹样、希腊古典渊源，与中国传统雕刻技法在此交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云冈模式”。也正是这一观点，揭示了云冈石窟在建筑雕刻方面民族化和世界化的双重特性，为其后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埋下了深厚的学术伏笔。

他们在云冈留下了许多动人的瞬间。有一张黑白照片，林徽因倚坐石壁小憩，阳光打在石壁上，照出她年轻的面庞。那时的她不过二十多岁，正是写下“你是爱，是暖，是希望”的诗人，也是在残垣断壁间架梯登高、悬梁攀壁的建筑学者。考察云冈时，她与同仁们一道拂去厚厚的尘土，一处不落地测量、绘

图。她的四月天，不仅写在诗里，更刻在那些被汗水浸透的考察手稿中。

从1933年到1937年，林徽因曾3次赴山西，先后考察了大同古建群、云冈石窟、太原晋祠、五台山佛光寺等古迹。那些年，她和梁思成行走在乡野庙宇间，用脚步丈量着中国古代建筑的每一寸遗存。

今天，我站在四月的云冈，拍下了一树一树的桃花。镜头里，桃花掩映着千年石壁，佛陀的微笑穿过岁月，与春光相映。我忽然想：如果林徽因当年是在四月来到云冈，看到满山桃花与千年石窟交织的景象，她会写出怎样的诗？也许会有，叫作《云冈的四月天》。

但也许，她的四月天，早已以另一种方式留在了这里——在那些严谨的测绘图纸里，在那些至今仍是研究北魏建筑样式的参考文献里。诗意与学术，在她身上从不是割裂的，而是同一种对美的执着追寻。

时光流转，90余年过去了。当年的泥泞土路早已变成平坦的旅游通道，当年的残垣断壁得到了精心的保护修复。今天的云冈石窟，现存254个大小窟龕、45座主要洞窟、59000余尊造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武周山下的桃花年年如期绽放，春去秋来，周而复始。

而梁思成与林徽因留给云冈的，远不止一篇学术论文。他们用专业与热忱，为这座千年石窟注入了现代学术的生命力，他们证明了，爱与专业，可以让一个地方被世界重新看见。